

政 治 性

学 术 性

指 导 性

大转折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
红军长征文化研究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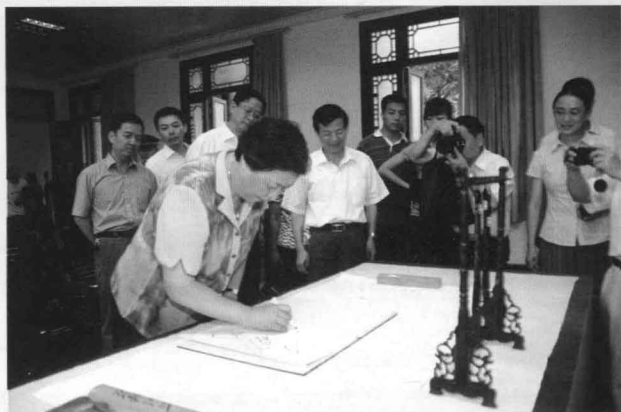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纪念馆 主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 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2010年7月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中)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并在遵义会议会址留影。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签名留念。



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参观红军烈士陵园。

摄影：李先进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 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2010年8月3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左一)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会议会址留影。



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



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

摄影：李先进

邓小平 论 遵义会议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

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节选自《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一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8—339页。）

下图为位于遵义会议陈列馆第5单元的陈列展板。张小灵 摄



目录

CONTENTS

2010年第3、4期 ZUNYI HUIYI JINIAN GUANZHUBAN



本刊顾问

慕德贵 王晓光 王秉清 余遵义
周素平 张明辉 余 玲 申 楚

本刊特邀编委

杨升平 刘志义 胡凤海 张鹏健
黄天舜 张黔生 费侃如 田兴詠
雷光仁 赵福贵 刘克钧

本刊编委会

主 任：陈 松
常务副主任：赵福超
副主任：王志力 张 弘 吴德坤
王锡灿 冉世勇
成 员：张小灵 何晓曦 黄文军
杨 利 蔡媛媛 潘开矛
蔡建梅 张云莲 袁文彬
杨 萍 张文静 李 琴
周芸竹 方永芳 张 勤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2

【卷首语】

邓小平论遵义会议/3

【特别报道】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6
亲切的关怀 殷切的期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考察纪行/张小灵/7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考察/9

【遵义会议史实研究】

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述评/费侃如/10
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赵福超/15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刘晶芳/17
遵义会议选择在遵义召开之非军事因素/林茂前/21
戎马一生美名扬——访遵义会议的见证人曾美将军/易俭如/23
鲜为人知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李卓然/何立波/24
中央政治局泗渡会议制订《渡江的作战计划》/黄超 朱存福/26

【长征史实研究】

红军长征在黔时期后勤供应工作探析/裴恒涛/27
论四渡赤水之“奇”/李俊亭/39
胡耀邦与遵义的“长征情结”/张小灵/41
红军长征与茅台酒/冯荔英/43

【邓小平住址史实研究】

邓小平与遵义会议/费侃如/45
邓小平四进遵义城/石永言/48
邓小平与《红星报》/李贞刚/49
话说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址/周国珍/50
关于邓小平住址碓窝井九号的回忆/傅珥/52

【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专辑】

深入研究陈云党建思想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服务——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朱佳木/53
像陈云同志那样勤奋学习/张全景/54

政治性

学术性

指导性

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王庭大/57
重温陈云同志党建思想,做好新时期的党建工作/陈元/58
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60

【人物春秋】

无尽的思念——缅怀父亲、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蔡生金/蔡建梅/62

【湘江潮讯】

王晓光出席“浙江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暨签约仪式/64
遵义市委、市政府任命我馆领导干部/64
外国语学院与遵义会议纪念馆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64
遵义会议纪念馆申报“一号工程” 助推红色旅游发展/64
遵义会议纪念馆加快整合红色资源/65
中国美协“赴革命纪念地创作采风”写生团赴遵义会议纪念馆采风/65

【他山之石】

河北:斥资6000万修复“红都”西柏坡旧址/66
湖南:纪念红一方面军成立80周年浏阳会师群雕揭幕/66
四川:红军烈士陵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66
广东:全国首家地方团史馆——广州团史馆落成/66

【“红军山”文艺副刊】

平民邓小平(外一首)/张小灵/67

【馆史之窗】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史/包坤明/68

封面: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址

封二: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封三:四渡赤水论坛在贵州习水召开

封底: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刊中画:

陈云铜像揭幕仪式在我馆举行/31

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遵义隆重举行/32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考察/34

首届中国红军节在遵义市习水县隆重举行/36

中直育英学校同学会红色之旅访问团莅我馆参观/38

大转折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
红军长征文化研究学刊



主 办:贵州省遵义会议纪念馆

编辑部主任:张小灵

编 辑:何晓曦 莫少阳

美 编:王 艳

编辑部地址:遵义市子尹路96号

邮 编:563000

电 话:0852-8234151

传 真:0852-8257419

邮箱地址:zyhy35115@126.com

登记证号:贵州省(报刊)连续性

内资字第ZYSK25号

准印证号:黔新出(报刊)2010年连续性

内资准字第364号

印刷单位:贵阳快捷激光印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51-6551601

编印时间:2010年12月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并向全国党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李长春参加会见 习近平贺国强参加会见并出席会议

新华网北京2010年7月21日电（记者徐京跃、李亚杰）全国党史工作会议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党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参加会见并出席会议。

上午9时30分，当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同出席会议的代表见面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胡锦涛等高兴地与代表们亲切握手，热情交谈。

习近平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讲了五个问题：一、进一步提高对党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三、加强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四、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五、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建党89年来，我们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今天，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习近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

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习近平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要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党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指示精神，积极关心党史工作，对加强和做好党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及时研究解决党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党史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

亲切的关怀 殷切的期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考察纪行

■ 张小灵



刘延东(左一)对遵义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寄予厚望。

便风尘仆仆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参观，了解这段在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历史画卷。纪念景区内一幢幢青砖黑瓦的特色建筑，会址红楼里的一件件实物、陈列展览中的一件件展品，都激起了她的浓厚兴趣。在毛泽东同志为遵义会议会址的题词前，在三十名女红军的群像前，在遵义市区红军各部队驻地分布图前，刘延东兴致勃勃地认真驻足观看，不时详细地询问了解情况，不停地颌首说好。在听到讲解员说有点遗憾的是毛主席建国后没回过遵义时，刘延东说，毛主席独一无二的为遵义会议会址题词，毛主席的字，可回到

了遵义！

2010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国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群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谌贻琴，省政协副主席孔令中，中共遵义市委书记慕德贵，中共遵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余冷等陪同下，赴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考察。参观考察途中，刘延东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亲切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对遵义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旅游发展、长征文化打造等工作寄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殷切的期望和指导性的意见，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温暖，送到老区人民心间。

“这个展览布置得很好，我很满意”

位于遵义会议会址东侧300米的遵义会议陈列馆，是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而修建的。陈列馆陈列布展以红军长征为主线，以遵义会议和红军在遵义的活动为中心，全面真实地展示了上世纪中国革命史上从红军创建到陕北胜利会师这段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历史。

下午4时，刘延东一行不顾一路奔波劳碌，一下车，

在陈列馆郑重地签名留念后，刘延东专门对遵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and 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说，遵义会议陈列馆这个展览布置得很好，我很满意！把整个红军长征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展示。展览中很多照片效果非常好，每一个人物都很清晰。遵义在文物保护方面很有远见卓识，目前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保护范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签名留念。



与遵义市委书记慕德贵在遵义会议会址合影留念。

围，抓得非常出色。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关键的转折点。有了遵义会议，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展览，给我们揭示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办的很不错，很有看头。

“入党46年来，今天在遵义受到了一堂深刻的党课教育！”

在参观考察中，刘延东听取了慕德贵和纪念馆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每年接待150万观众，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并准备在做好一方面军红军长征展览的同时，还要做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展览。对此，刘延东寄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回顾历史，就是为了不忘历史。挖掘总结历史经验，就是为了加强思想工作。我们要进一步坚持纪念馆博物馆的公益性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保护利用革命文物，挖掘研究革命史实，充分发挥革命遗迹的思想教育作用，全面提升革命史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要进一步把爱国主义教育党的建设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党的建设服务，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

刘延东动情地说，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我对这里充满了敬意。在遵义会议75周年之际，来参观这个展览，显得更有意义。入党46年来，今天在遵义，我受到了一堂深刻的党课教育！

“发挥长征纪念基地作用，为党的九十周

年献礼”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第一批修建的烈士陵园，长眠着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邓萍烈士等红军英烈。虽是下午五点，还有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的人们，在这里瞻仰圣迹，祭奠英烈，净化灵魂。刘延东一行前往烈士陵园敬献了花篮，瞻仰了红军烈士纪念碑。看到络绎不绝的参观人流，她连声称赞遵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发展抓得不错，很有成效。

据石宗源介绍，25年前，刘延东曾陪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来过遵义。今天，在亲眼目睹25年来遵义的进步和变化后，刘延东十分高兴，对遵义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尤其对遵义在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表示赞赏，认为中央党校及上海、井冈山、延安等干部培训学校的学员，应该到遵义来进行党课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她表示，将向有关部门建议，尽快推进该项工作。

刘延东希望，遵义要进一步抓住“长征”这个很好的定位，突出“遵义会议”这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品牌，进一步巩固扩大革命文物保护、红色遗迹利用、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发展、长征文化打造等方面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把遵义建设成为红军长征纪念基地、红军长征文化研究基地、红军长征红色旅游基地，以优异的业绩，向党的九十周年献礼。

下午五时三十分，刘延东一行结束对遵义的考察，踏上下一站的征程。而她情系遵义老区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将成为这片热土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源泉。



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考察



本刊讯 2010年9月1日，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现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考察。栗战书、赵克志强调，当前，贵州正处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一定要高举发展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调研期间，栗战书、赵克志一行首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瞻仰了红军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栗战书动情地说，我和克志同志之所以把下基层调研的第一站安排在遵义，很重要的就是来这里接受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遵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们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不怕牺牲，不畏困难，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让我们深受教育，十分感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尤其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概括的“贵州精神”，用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激励我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为贵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幸福而奋勇前进。

栗战书指出，遵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地位特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遵义人民历史上为迎接红军、支持长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遵义会议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使遵义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遵义，全党关注、全国人民关注遵义。遵义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在贵州、在遵义工作的同志，肩上都承担着特殊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定要认清使命、不辱使命、尽

职尽责，把遵义、把贵州建设得更加美好，造福于民。

栗战书强调，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努力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长征精神这一全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形势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弘扬长征精神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长征途中，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攻克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这些英雄壮举，启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必须有突破、攻克、强渡、飞夺、翻越的英雄气概和意志力量。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全省上下高举发展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与遵义会议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视察我省抗旱救灾时提出的“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斗、夺取胜利。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建设“团结、务实、勤奋、廉洁”的各级领导班子，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赵克志在讲话中强调，目前正是编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期，正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从现在到2020年的这10年，我们国家都将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也是加快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都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贵州精神”，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奋斗，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本刊记者)

文中插图为栗战书(前排左二)，赵克志(前排右二)在市委书记慕德贵(前排左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光(前排右一)陪同下，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李先进 摄

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述评

■ 费侃如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党和国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很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陈云的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由于陈云生前一贯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专门研究陈云与遵义会议这一课题的论著和文章还不多，本文仅对20年来出版发表或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访谈记录有关陈云与遵义会议部分作一述评，以期陈云研究沟通信息、交流观点。由于掌握资料不全面，又限于理论水平，文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请广大读者赐正。

一、关于陈云与遵义会议的文献档案原始资料

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1934年12月中旬，黎平会议后，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红军进驻遵义后，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的这些经历资料，包括他当时写的文献、文章、回忆录、调查访问和有关长征日记等，所以也并非全部为原始资料。这方面资料尤以《(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2)、特别珍贵。文章有《随军西行见闻录》(3)、《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4)、《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5)对有关问题的批示和访谈记录有：《陈云同志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的复信》(6)、《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7)、《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恢复陈云同志当年居室旧址的答复》(8)、《对胡乔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成文时间的考证的批示》(9)、《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10)、《陈云同志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11)、《陈云同志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谈话记录》(12)等。还有陈云长征初期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时，该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的《陈伯钧日记》(13)、这些文献档案的发表，以及陈云对有关问题的批示，解决了一些党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键问题，同时，为深入研究陈云与遵义会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大意义。

二、出版的关于陈云的书籍和已发表的评介文章及对陈云与遵义会议的研究情况

国内外的研究者撰写的陈云传记中，无不设有篇章记述他参加遵义会议及前后的情况，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史料，已出版的书籍有：《陈云》画册(14)、《伟人之初：陈

云》(15)《陈云年谱》(16)、《陈云之路》(17)、《陈云》(18)等。这些书籍都是写陈云一生的，然而，都把他参加长征、出席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过泸定桥后，他根据中央指示离开长征队伍，历经艰险，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尔后又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作为他一生中重要的经历，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

专门论述陈云与遵义会议的文章，尚未见有；但有关陈云与遵义会议及其前后史实有关的文章已发表了不少，比较有影响的有：2001年发表在《党的文献》第4期陈群的《关于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84年发表在《瞭望》第10期邹爱国的《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1997年3月1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迟爱萍的《陈云：长征的亲历者和最早宣传者》，1990年发表在《党的文献》第2期黄启钧的《关于1935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1984年11月8日发表在《四川日报》杨子江、叶邦荣的《陈云同志深切关怀红岩烈士》，1988年发表在《贵州党史通讯》第3期王炎离的《长征途中，潘汉年和陈云不是一起去白区的》，1991年发表在《党的文献》第5期朱佳木的《长征路上的珍贵文献——读〈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1987年发表在《贵州省博物馆馆刊》第4期费侃如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发表及其意义》，1987年《文物天地》第3期雨峰的《遵义会议和新发现的两件遵义会议文物》等。这些论文和专题资料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不仅论述了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还为争取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对他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以及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赴共产国际的经过，进行了记述和考证，使长期以来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

三、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随着一些文献档案的刊布和各种历史资料的发表，近20年来对陈云与遵义会议史实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主要问题已逐步清晰起来。可是，仍有些问题在党史学界还存在着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陈云参加遵义会议时身份的两种说法

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有关部分来看，陈云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学术界有两种说法。陈云逝世时中央所发的讣告和《陈云年谱》，都说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上,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关于这个问题记得较详细的是迟爱萍的《伟人之初:陈云》一书,她写道:“1931年9月,临时中央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933年)1月中旬,陈云同博古等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瑞金……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陈云出席了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部长。”(19)程中原的《张闻天传》一书中,根据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32年3月11、14日临时中央会议记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秦邦宪是总负责人,张闻天是‘临时中央政治局’9名委员之一(另外8名委员是:卢福坦、秦邦宪、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成员(另外三个成员是卢福坦、秦邦宪、康生。1932年3月卢出,陈云进)……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常委(这时政治局常委共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20)有的学者撰文也认为五中全会后,依据有关材料“大体可以判定当时书记处的成员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有的史料中还提到有项英”(21)。对陈云何时开始担任政治局委员,有的研究者进行考证后认为:“应从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周恩来传》第240页)。他原是中央委员,这时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但还不是常委。何时成为常委,《张闻天传》(第131页)根据张《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定为1932年3月卢福坦离开政治局常委,陈云进。但现在还缺乏档案佐证。应该说,陈云从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书记(常委),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以后。”(22)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也有说陈云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遵义会议的,而当时不是常委。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23)直到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4)遵义会议参加者、当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写道:“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25)没有提及陈云这时是常委。胡乔木在回忆延安整风运动时说:“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26)还有研究者撰文认为常委“是指进入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的人物。这

个核心,一般认为是从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开始有的,称为中央书记处(也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六届五中全会之后的各次中央会议及遵义会议上,均没有提到增补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常委;也没有提到取消项英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而由陈云代之。据笔者所查,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前七人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陈云、康生三人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所以,如果说陈云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的,似应是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陈云的传略,也写道:“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起,为历届中央委员。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指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28)此处并未提到陈云是政治局常委或书记处书记。

(二)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地点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著述都提到陈云在遵义会议后离开长征队伍,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究竟在什么时间、怎样离开长征队伍的,却语焉不详。还有说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离开长征队伍的。

1985年2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向陈云了解长征途中泸定桥会议的情况;陈云答复说:“那次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29日——引者注),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少奇、博古、刘帅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就是那次会议后,他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29)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也谈到此事,说:

“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曦三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我们各走各的……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我也去莫斯科了……”(30)根据陈云本人自述,他是1935年5月底红军过泸定桥后,于6月离开长征队伍,按中央决定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这两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以后又有同志撰文详细记述了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的情况。(31)还有同志根据军委纵队(当时陈云随军委纵队行动)离开天全县城经灵关殿(场)到中坝宿营的具体时间,判定陈云是“1935年6月11日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32)至于陈云是否和潘汉年一起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经陈云自述和通过研究,他们两人是各走各的,潘汉年在陈云之前先行赴上海,这个情况已清楚。(33)

(三)陈云到共产国际的时间和任务

从上述陈云谈泸定桥会议内容看,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主要任务是恢复那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党组织,这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党的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成立的,它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它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作,保持和疏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34)曾遭到敌人三次大破坏,仍于1935年3月中旬再次成立了上海临时中央局,“8月间,陈云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并与再次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35)在此之前,大约在6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潘汉年等到达上海的消息后,“立即从海参崴派出联络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起前往上海。主要任务是:(一)催促苏区快派代表来莫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二)将潘汉年、陈潭秋、杨之华等人接到莫斯科;(三)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并命主要负责人来莫斯科,同时接收上海与苏区的交通关系。……8月中旬,上海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在沪代表的意见,陈云也不得不离沪赴莫……约在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陈云等抵莫时,正值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陈云、潘汉年列席了此次大会。”(36)这一说法是根据有关档案而来,是较准确的,过去有文章说陈云是在8月20日至21日左右到莫斯科的,看来有误,时间相差了近一个月。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主力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作为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十分关心红军的动向,但只能引用外电和报刊提供的资料,来综述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军阀进行战斗的情况。11月6日、13日、14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新的战区》、《中国农村的破产》、《争夺四川的斗争》,12月15日发表《饥饿的中国》。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是多么迫切盼望能尽快得到来自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的真实情况,以便根据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阀的斗争中,适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因此,1935年6月,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得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潘汉年,受党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到了上海的消息,立即派联络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与潘汉年联系。“8月间,陈云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并与再次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党组织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陈云和潘汉年都去莫斯科。但因陈云的任务是在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故决定陈暂不去,让潘汉年先走……8月中旬,上海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在沪代表的意见,陈云也不得不离沪赴莫……从10月2日起,陈、潘分别以史平,白林的化名,同陈潭秋等人一起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会议,陈云并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37)

陈云赴莫斯科之时,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与沪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仍处于中断状态,陈云离沪是按共产国际在沪代表意见去莫的,这时不可能带有中共中央给予的任务。但由于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组织领导了长征的大部分过程,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迫切想了解中共领导红军主力进行长征的情况;因此,陈云到莫经

过半个月的准备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于10月15日专门举行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红军长征的报告,陈云系统地、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军从江西出发进贵州,到遵义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一直到过金沙江的过程。在他二万多字(翻译稿)的报告中,对遵义会议虽然没有展开来说,但用了很大篇幅介绍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不难看出陈云对毛泽东的拥戴之情,并用大量实例极力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新领导有所了解,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历史已经表明,陈云的这一努力,在红军还未到达陕北也尚未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前,他已为尔后共产国际承认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过去国内外许多著作,都说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莫斯科专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的。如上所述,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正由于中共中央没有授予陈云赴莫汇报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任务,而是应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要求才作的报告,因此,才更能体现出一个正直共产党人非常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四)陈云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乙)》)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内部发表,编者附了说明:“《(乙)》是陈云同志为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的手稿的一部分。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现存中央档案馆。这份传达手稿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其中对遵义会议酝酿的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手稿保留了许多尚未公布的历史资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对弄清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帮助党史学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38)

1985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将《(乙)》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公开发表,并注明:“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手稿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39)同时,在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全国省级以上报纸几乎都全部转载了《(乙)》的全文。《(乙)》的公开发表,对解决遵义会议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对准确宣传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起到了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为节约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一期间也发表了一些考证《(乙)》形成时间的文章。(40)

前些年有研究者通过对《(乙)》内容的研究,和与《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比较后,对《(乙)》形成的时间和作为传达提纲提出了质疑。(41)

最近又有同志对《(乙)》进行了考查,认为《遵义会议文献》一书中“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四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上述标题、时间判断和题解,都是不正确的……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内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内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时间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42)也有同志从保持档案材料原貌的原则撰文认为《(乙)》“不宜稍加考证即另定一个题目,使人不解的是,《(乙)》原件上明明写的‘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公开发表时竟改为‘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也未注释为何改动,这就有违档案整理原则了。”(43)

以上对《(乙)》的质疑、再考证,已经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群在一篇文章中最后写道:“近来,党史界有的学者对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质疑,认为从手稿内容来分析,有的地方不像是‘传达提纲’,更像是‘汇报提纲’。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尚缺乏更有力的证据。随着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不断挖掘,相信这一问题终将得到圆满解决。”(44)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石仲泉撰文写道:“……对将这份文献(指《(乙)》文——引者)认定为《传达提纲》提出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再将那份文献与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相比较,从内容和用语来看,似乎更像同一时期,在同一地域写的文献。因此,这是不是向共产国际的一个‘汇报提纲’呢?”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加的,并非报告标题。他实际上没有并重的讲两个问题,关于遵义会议情况讲的较少。而被认定为《传达提纲》的那份文献,却将遵义会议内容作了较多介绍。如果将它认定为‘汇报提纲’,上述几个疑问都不存在了,费文提出的一系列质疑也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45)

(五)《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

《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随》)“1936年它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全民周刊》。同年10月7日,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这应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年3月,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曾将《随》一书首次在国内单独出版,书名改为《随军西行记》,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年6月,又以《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的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46)。上述所引《随》文发表经过,由于未注明《随》文的作者,笔者又未见到过这些原作,不知《随》文最初发表时署名是谁?笔者最早见到《随》文是1955年5月第一版、1958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随》文放在该书的首篇,署名“廉臣”。1985年

1月,《红旗》杂志首次以陈云名发表《随》全文;并注明是1935年秋写的;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此书单行本。长期以来,对《随》是陈云于1935年秋写的从未见有异议,仅在2002年贾建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随》作于1935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作者们化名‘廉臣’……据推断当时的作者是缪楚黄、杨定华等。”(47)遗憾的是文中没有说明“廉臣”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作者化名的根据,也未注明推断作者是缪楚黄和杨定华的理由。然而,对《随》文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作为学术研究,弄清《随》这篇珍贵文献的作者是谁,也会起一定作用。

四、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展望

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近20年来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成果的质量亦是较高的。但对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转折关头及其前后的杰出贡献来说,应该承认研究工作还远非是充分的。对于今后陈云与遵义会议的深入开展,我以为有几点值得重视。

(一)继续挖掘资料

加强考订当前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前后的资料搜集,还不能完全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取得丰富翔实的资料,是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条件,研究人员希望有关陈云与遵义会议的档案资料进一步开放。例如,六届五中、六中以及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会议的决议、记录以及共产国际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都是研究陈云在长征期间活动的核心资料;公布和查阅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定会给陈云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当然,对已公布发表的文献还需进一步加强考订辨析。比如《(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中提出的各种看法,如不加以分辨有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的回忆录、专著中的记述也不一定准确,都需要参照各种档案材料来进行辨析。

(二)拓宽领域,开掘深度

从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乎是空白,近20年来虽已取得不少进展,但还需要拓宽领域,开掘深度。对《(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较多,而对长征初期他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征途中写的《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以及他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等文献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应当引起党史工作者的重视。陈云从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遵义会议上态度明朗地支持毛泽东,这几年的工作和思想变化过程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积极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学术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年来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同观点的争论相对滞后;只有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才可能深化研究者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出新的探索,最后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在争论中,只要言之有理,有根有据,就不能用行政手段限制发表某种观点或允许发表另一种观点。现在学术研究环境空前宽松,相信在百家争鸣方针指

引下,陈云与遵义会议研究必将会出更多、水平更高的成果。

注 释

- (1)《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1页。
- (2)《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 (3)《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 (4)《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 (5)《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
- (6)《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1983年版，第126页。
- (7)《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13页。
- (8)《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2页。
- (9)《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10)《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1页。
- (11)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78年5月18日整理稿。
- (12)据遵义会议纪念馆1977年8月23日记录稿。
- (1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 (15)迟爱萍：《伟人之初：陈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17)叶永烈：《陈云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18)(美)大卫 M 贝奇曼：《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19)迟爱萍：《伟人之初：陈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4、130页。
- (20)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217页。
- (21)李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第14页。
- (22)钱听涛：《对〈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文之我见》，1994年5月16日《党史信息报》第2版。
-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 (25)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 (2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 (27)常甲辰：《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94年2月16日《党史信息报》第2版。
-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传略》第35页。

(29)《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1页。

(30)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

(31)杨子江、叶邦荣：《陈云同志深切关怀红岩英烈》，1984年11月8日《四川日报》第2版。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32)费侃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33)王炎离：《长征途中，潘汉年和陈云不是一起去白区的——兼与刘昌亮、刘晓同志商榷》，载《贵州党史通讯》1988年第3期。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载《党的文献》1990年2期。迟爱萍：《陈云：长征的亲历者和最早宣传者》，载《中国青年报》1997年3月14日第11版。

(34)马红：《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合订本第359页。

(35)、(36)、(37)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38)《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11—12页。

(39)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40)费侃如：《关于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成文时间的考析》，载《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朱世荣：《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点考证》，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侯保重：《也谈陈云同志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时间问题》，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1期。赵福贵：《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成文的时间的商榷》，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6期。

(41)费侃如：《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形成时间再研究》，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费侃如：《我的七点质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试析》，载《党史纵横》1993年第4期。

(42)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

(43)费侃如：《慎待档案——关于遵义会议两份重要档案改动情况》，《贵州档案》2003年第5期。

(44)陈群：《关于陈云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45)石仲泉：《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之六》，《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46)曾景忠：《红军长征史史料研究概述》，《中共党史资料》第44辑第213页。

(47)贾建民：《〈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篇报道红军长征的文章》，2002年8月7日《党史信息报》第6版。

(作者单位：遵义会议纪念馆，本文选自《陈云研究述评》上册，第138—1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

■ 赵福超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关头，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将带来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些挑战面前，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鉴往知来，回顾作为我党民主革命时期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的。

一、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遵义会议上博古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辩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推卸主观责任，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们纷纷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1)敌强我弱，虽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关，但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对比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对比是6:1；第三、四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对比都是10:1，敌强我弱，但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主观军事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对比仍是10:1，红军为什么失败？“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主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2)“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3)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在反“围剿”战争中各方面工作配合不够，这虽与失败有关，但不是失败的决定因素，过去的4次反“围剿”斗争，各苏区根据地都比第五次反“围剿”时小，瓦解敌军是有限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在靠近中央苏区的边缘发生了福建事变，这对我军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左”倾的军事指导者却“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4)不懂得“利用反革命内部的第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5)结果使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得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博古在《报告》中强调

的后方工作对前方战争支援不够，影响第五次反“围剿”胜利进行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当时，“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地扩大了……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6)遵义会议的这种通过说理分清是非的做法，成为后来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7)就是这个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的结果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央红军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而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了惨痛的损失。鲜明的对比使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日益不满，王稼祥说：“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8)

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他说：“同志们对党中央领导反第五次围攻的失败提出不少意见。党中央认为，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50万白军围攻，红军不过10万人左右，而且敌人采取碉堡政策，团团围困也是很难打破的。再则，自从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主力退出到川陕边区以后，中央红军的战斗是孤立的……”(9)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上，许多同志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周恩来在会上的副报告就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驳斥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作的辩护。他深刻地指出：从来红军对白军作战，至少都是以一对五。白军数目庞大，红军数目少，这在中央苏区是早有的事实。在第三次反围攻的时候，红军3万人，白军30多万，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关键在于红军没有集中主力打运动战，而是分兵死守。至于讲到敌人采取碉堡政策就不能打破，那更是完全错误的。白军主力深入苏区，红军主力也可以深入敌人后方，到南京、上海、杭州、芜湖一带。敌人的根本重地受到威胁，就必定调回主力。红军可以在运动战中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第五次反“围剿”以前，红军有半年的休整时间，还比以前扩大了许多，群众发动得更加充分，苏区的反围攻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准备也好得多。打破敌人的围攻，从各方面讲，都是可能的。遭受失败，完全是由于领导路线的错误。他指出，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军事上显然更不利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不肯和十九路军配合，把自己孤立起来，让敌人各个击破，是愚蠢的。放弃一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采取单纯阵地防御，和有帝国主义支持的白军拼消耗，等于死亡；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又过于仓促，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给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精辟的发言，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朱德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才能取得胜利，中央军委应该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中央的领导工作应该让毛泽东同志负责主持。历来事实证明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10)张闻天受会议委托，根据毛泽东等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

三、遵义会议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基本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在揭露党内“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时，着重指出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忽视和削弱集体领导。会议指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劳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为不正常的现象。”(11)这些尖锐的批评、中肯的结论，既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包办，也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集体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遵义会议选举产生了党和红军的集体领导班子，确立了实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职务，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领导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改组，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

党内民主，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轨道。正是由于在遵义会议上开创了集体的领导并在以后坚持了集体领导，党才战胜了以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四、遵义会议的启示

(一)一个坚强、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开端，正因为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党的事业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邓小平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集体领导，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12)从党的一大召开到遵义会议13年半的时间，我们党频繁更换领导，但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关系重大。当年，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同样，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还会在“左”倾错误中摸索。

一个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必然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从而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而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处理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核心。我国还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配合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13)此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在异常尖锐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核心。

一个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邓小平曾经严肃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14)他还指出：“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15)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超越战略，就要十分注意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央调控，因此，必须(下转22页)